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

蒋寅 主编

# 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

〔日〕松原朗 著

李寅生 译

中华书局

6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

蒋寅 主编

## 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

〔日〕松原朗 著

李寅生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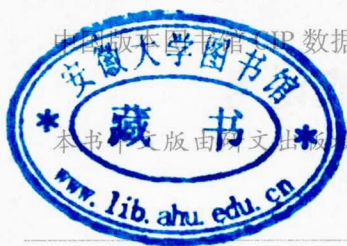
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日)松原朗著;李寅生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4.1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蒋寅主编)

ISBN 978-7-101-09632-3

I. 中… II. ①松…②李… III. 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7583号



- 
- 书 名 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  
著 者 [日]松原朗  
译 者 李寅生  
主 编 蒋 寅  
丛 书 名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1 $\frac{1}{8}$  插页2 字数250千字  
印 数 1-2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632-3  
定 价 45.00元
-

# 前言

蒋寅

这套丛书是十位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论著的荟萃，约略反映了日本学界中年一辈专家研究唐代诗文的重要成果。

三年前，我与同事张剑兄一起翻译川合康三教授的《终南山的变容》一书，常就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进行一些交谈。正值王水照先生主编的《日本宋学六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我收到老友高津孝和浅见洋二教授的赠书，欣忭之余又不免有点遗憾，觉得日本研究唐代文学的学者更多，成果也更密集，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介绍给国内学界。张剑兄是个有心人，马上同学苑出版社郭强先生商谈，决定推出一套日本学者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丛刊，嘱我组织稿子。这当然是个好事，我欣然从命，马上邀约我熟悉的学者，并请川合先生等资深教授参酌推荐，最后商定请松本肇教授等十位学者各自遴选自己的论文，编为一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一套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丛书。

这一倡议承蒙诸位先生慷慨应允，翻译、编辑工作很快就开始进行。正当我热切期待各位作者的书稿时，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传来，郭强先生因病猝逝！我与郭强先生素昧平生，自项目开始以来，尚未谋面。乍闻噩耗，惊悼不已，更为他的英年早逝不胜惋惜。

学苑出版社在郭强先生的努力下,历年出版不少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对当今学术的发展卓有贡献。他的去世,无论对出版社对学界都是个很大的损失。他的工作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因郭强先生离去,我不得不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另外寻找出版社。幸而得到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先生和汉学编辑室主任李晨光先生的支持,决定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这我和各位作者深感欣慰。

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界,是我酝酿已久的夙愿。从三十年前开始研究唐诗,阅读松浦友久教授的《詩語の諸相》,我就不断受到日本学者论著的启发,萌生翻译、介绍日本唐诗研究成果的愿望。1984年初我翻译了松浦教授的《中国诗的性格》一文,发表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从此一发不可收,陆续翻译了三十篇日本学者的论文,除了几篇友人邀约的译稿,多数是自己研究所需的参考文献。阅读日本学者的论文,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了解海外汉学成果对于我们研究的必要。同事刘跃进研究员多年来曾反复提到古典文学界“补课”的话题,其中亟需补的一门课,就是海外汉学。中国古典文学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海外每年都有不同语种的研究著作出版,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不了解这些成果,我们不仅会错过许多有益的启发、有价值的参考,甚至还可能出现课题撞车、重复劳作的结果。补海外汉学这门课,的确是刻不容缓的。

但要补海外汉学的课,又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许多国家、许多语种的研究著作,要去调查、介绍、翻译,这对我们的外语能力、经费和时间精力都是很大的挑战。近年,海外汉学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出版了一些专业刊物和研究著作。但我们对海外汉学的关注,整体布局还很不均匀,对日本、美国和西欧关注较多,对俄国(苏联)、东欧、北美和其他地区则了解较少。西欧也只是英、德、

法、荷几国了解得多一点,其他国家我们还不太清楚有什么学者做出了什么成果。这种情形与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亟需改变。

就当今海外汉学的格局而言,日本汉学历来最受国内学界的关注。这不仅因为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交流便利,更主要的是日本学者的成果扎实细致,广受各国研究者的重视。欧美学者凡治汉学的,首先必学日语,阅读日本学者的论著。我接触到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欧美学者,基本都懂日语,能看日语文献。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不能不了解日本同行的工作。

日本在古代曾是中国文化的热心学习者、研究者,从奈良时代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开始,日本的僧侣、留学生乃至商人来华,无不搜购大量的汉籍舶载回国,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近代以来,中国国势衰弱,社会动荡,大量公私藏书流散市肆,日本汉学家来华游学,悉留意搜罗,满载而去。著名藏书家的藏书也成为日本财阀渔猎的目标,陆心源皕宋楼和董康诵芬室的藏书就分别被岩崎和大仓两家财团购去。丰富的汉籍收藏,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典籍和古典文学提供了良好的文献条件,也保证了其研究课题的专门性和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当然,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值得我们尊重的还是其专业精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我们常不免将日本汉学成果视为可资借鉴的利器,但许多日本学者,尤其是老一辈的汉学家,他们都是像欧洲学者研究希腊、罗马文化那样,怀着一种亲切的眷恋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这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历来都投入最大的热情(也许只有明治以后的一段时期是个例外),他们对学问的虔诚和好学的天性,更足以保证其工作及业绩的高水准。西方汉学家素来重视日本学者的成果,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今新一代汉学家,虽然较老辈的治学立场已有所不同,更多地是将中国文学当作外

国文学来看待,但仍继承了日本传统汉学的专业精神,相比欧美汉学来,其学术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与欧美那些疆域广袤的国家相比,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足,近代以来一直以技术为立国之本,对新知识的反应和吸取极其敏捷。日本对外国的研究和了解,也明显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在日语里,信息一词的汉字写作“情报”,让人联想到军事和战争。日本学者做研究,确实就像是进行战争一般认真和精准,对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搜集得很完备。日本可能也是世界上翻译外国书籍最快、最多的国家,这使得日本学者总是能方便地掌握世界各国的学术动态,在较开放的视野下开展工作。而视野广阔,对别人的工作了解得清楚,就势必会限制自己的工作范围。就好像纪晓岚,学问有名的广博,同时人都奇怪他不著书,他说自己编四库全书,发现自己要说的前人都已说过了。事情就是这样,学问越深广,可能研究的课题就越细密,钱锺书先生便是个最好的例子。

我常感到,中国学者对日本汉学的议论往往流露出一种偏见,认为日本学者的论文选题狭小,行文短钉,注重资料荟集而疏于思理分析。这显然是对日本汉学了解太少的缘故。研究课题的具体和细化,是学术成熟和深入的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虽不如我们多,但他们的著作因为用功专精和细致,常达到令人佩服的深度。尤其是国内学术研究中断的二十年间,他们孜孜不懈的工作积累了许多重要成果。即便是这套丛书的作者,许多论文也是在七八十年代发表的,那时国内的研究还处于复苏、起步的阶段,而他们所探讨的问题却已相当深入,可以说领先于中国学者许多年。我在《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的前言里,曾提到过自己当时感觉到的国内中唐诗研究方面与日本的差距,以及从日本学者的论文中得到的启发,相信这套丛书仍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唐代文学在中国,因为受到传统评价的影响,一向只有盛唐诗独领风骚,中唐相对来说不太为人重视。直到80年代以后,历史取向替代形而上学取向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主潮,中唐文学研究才逐渐受到关注,蓬勃兴旺起来。而日本则不同,由于大诗人白居易与平安朝文学的特殊关系,以白居易为中心的中唐文学研究,一直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占有醒目的位置。1990年,由川合康三、松本肇等学者发起的“中唐文学会”成立,不仅团结了研究中唐文学的中青年学者,更改变了日本学术纵向延伸的学术传统,将一种与信息社会的特性相契合的学术运作方式带入了日本学术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都是中唐文学会的成员,但他们的成果绝不只限于中唐文学研究,而且他们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也是多样化的。

其中既有芳村弘道教授的传统文献学研究,也有深泽一幸、松原朗教授那种富有创意的新颖探索;既有松本肇、赤井益久教授的宏大议论,也有下定雅弘、斋藤茂教授的精微辨析,还有户崎哲彦教授那样的现地考察。这些论著,无论其选题立论之旨如何,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言之有物,论不虚发,绝无人云亦云、了无新意的论说。这是严肃的学术精神加严格的学术训练的结果,也是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准的保证。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学者的有些研究相当地生活化,与自己的生活情趣紧密结合。比如丸山茂教授研究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与饮食习惯,就是中国学者较少注意的。另外,日本学者明显对自然名物感兴趣,这也许和他们中小学充分的自然知识教育有关。孔子论学《诗》的意义,不就有一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么?看看市川桃子教授对唐诗中花草果木的研究,就会感觉古典文学研究其实可以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距离很近,但我们经常都忽略了这一点。

说起来,这十位作者都是我熟悉的朋友,除了松本肇教授去年已荣休,其他九位都是各大学的中坚教授、活跃于当今学界的中年



专家。多年来,阅读他们的论文成为我很好的学习机会,由熟悉他们的研究,进而了解了日本的学术。我很高兴有此机会,促成他们的论著在国内以中文出版。在此我要向各位作者和译者表示感谢,同时向中华书局和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努力的李晨光先生、孙文颖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我相信我们都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

2011年1月10日

## 中译本序

《中国离别诗之成立》(东京研文出版社,2003年6月20日第一版)的中译本《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由中华书局(北京)出版。作者感到由衷的喜悦,对支持、促进中译本出版的有关各位学术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正如《序言》与《后记》所述,离别是代表六朝后期至唐朝前期最为普遍的主题,尤其是开元、天宝至唐朝前期一般诗人的作品里它占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比率。离别固然是当时的重要主题,但是,在此之前,汉魏六朝前期却不易见到,而唐朝后期也没有如此繁多的作品。正因为如此,要考察六朝后期乃至唐朝前期的文学时,离别诗广泛流行的特殊情况绝不可忽视;再者,它为何只在当时如此流行的问题也不可探讨。本书由这些观点来写下,希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蒋寅教授来信将《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的计划通知我,并劝我参加。当时,我手里没有汉译稿,也找不到翻译者,如是没有明确地答应。再过半年多时间之后,蒋寅教授又与我联系,说可以给我介绍一位合适的翻译者,这位乃是广西大学的李寅生教授。其实,李教授曾经早已帮我翻译过几篇论文,虽没有见过面,但可以说是同道学友。这样,我就托蒋寅教授请李寅生教授翻译拙著。李寅生教授接受了我的请求,于百忙之中抽

出时间,细心翻译拙著。此次拙著能与中国读者见面,全蒙蒋寅教授的奖掖和李寅生教授不辞辛苦的翻译工作。

最后,当本书出版之际,再一次向有关各位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也希望本书能为喜爱古典诗歌人士所广泛阅读,进而达到日中学术交流的效果。

松原朗

2007年5月1日

## 凡 例

一、本书中所引用的诗文作品,主要依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全唐诗》、《全唐文》,个别采用了与别集校对后的底稿本。

二、本书中的圈点符号,除去特别注明出处者,均为笔者所加。

## 序 言

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以“离别”为“主题”的相关内容。首先,通过具体的离别诗作品来考察“离别”主题的形成,是本书最大的课题。其次,在整个文学世界中这一“主题”是如何确立的,也是一个始终需要探讨的问题。因而就本书内容的性质需要向读者事先说明的是,本书并不是针对特定离别诗作者的诗人论研究,也不是针对特定离别诗的作品论尝试。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世界中,主题并不是由诗人在当时当地任意设定的,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种倾向。一般而言,中国古典诗歌与其他各国语言的古典诗歌一样,具有明显的固定格式性。在诗歌创作时,事先要有一定的诗体存在,几乎没有脱离诗体而成诗的作品。而另外的一种情况是,诗歌创作时,有一定的主题群存在,而脱离其主题的制约进行创作的情况也几乎是没的。中国古典诗歌的主题,由于其数量有限而且样式固定,因而围绕着每一个主题就会形成一个共同主题的作品群体,我们才可以进行完整的主题创作论研究。“离别”的主题,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题之一,而且也是为许多作品所集中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主题。本书之所以选取诗歌主题论这一研究方向,并在众多主题中特别选取“离别”来论述,便是以此为根据的。

重复言之,也就是说,中国古典诗歌中本身含有一定的主题

群,诗人们是在一定的主题的范围内进行诗歌创作的。而随意追加一些主题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也就是说,主题是固定的,一个主题被认知后,会被追加到既已存在的主题群中成为一个新的主题,但这期间需要充分的形成过程。其形成过程由于不同主题而不尽相同,而“离别”主题在以下三点特征上,表现得尤为富有趣味。第一,所谓的“离别”主题,原本是不存在的。亦即在处于中国古典诗歌实质出发点位置的建安时期,以及承此之后的竹林七贤正始时期,虽然有数首离别诗存在,但还不能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第二,“离别”主题,是在相当漫长的时间内才形成并成熟起来的。离别诗的持续创作,是在刘宋时期鲍照以后才开始的。其后到盛唐时期的王维为止,约三百年的漫长时间里,才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样式。“离别”主题的成熟,必然需要经过这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第三,“离别”的主题,恰如抛物线一样,在文学史中描绘出了兴盛和衰退的巨大弧线。表达“离别”主题的诗作,从盛唐至中唐前期之间最为多见,因而出现了兴盛的局面;但是到了中唐后期以后,离别诗出现了衰落现象,从而进入了相对的衰退时期。

“离别”的主题由于上述的三个特征并存,为我们考虑文学中的主题是如何确立起来的这一根本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文学中的“主题”,并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无论何时何处何人都能够共同分享的情怀,它不是一种先天性的存在。它毋宁说是人们在刻写文化历史时,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一提到“离别”,就会想到人们在人生中必然会遇到的两种离别事件——死别与生别。但是这些离别现象与表达离别主题的文学创作绝不可以相提并论。如果放到中国文学史上来谈的话,离别的事件何时何地都存在,但离别的主题在三国曹魏之前尚处于完全不自觉的阶段,而到了刘宋的鲍照时期才逐渐自觉地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题。

而且,主题并不是抽象存在在作品内部的。主题只有将自己血肉化之后,才能成为一件作品。所谓的血肉,亦即其样式。因而,主题·样式·作品这三者在原理上,一般认为是遵循着主题→样式→作品的创作理论规律,但在作品产生的时点(时间·空间),三者却是终始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而在这个结构中处于最重要位置的,大概便是样式了。主题的成熟程度体现在样式的成熟程度之中。当表达由离别所产生的感动的样式尚未成熟时,实际上也意味着离别主题的尚未成熟。

离别诗自六朝以后至盛唐时期的数百年间,样式达到了完备,换言之,离别主题的形成和确立需要如此漫长的一段时间。其样式在盛唐时期趋向单一化·僵硬化之后,离别诗失去了清新的生命力,中唐后期以降其地位开始相对的下降。这其实也是主题与样式不可分割的一个佐证。正是这样,文学的“主题”有其成立的历史,也有其衰退的历史。因为“主题”与“样式”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而“样式”的基础在于语言这一历史范畴的内容之中,因而“主题”也无疑属于历史的范畴。——“主题”是历史的产物。本书中针对离别主题的考察,便是为印证这个普遍性命题所作的一项工作。

本书是笔者十余年间主要在《中国诗文论丛》发表的离别诗论考文章的汇编,在论文成书之际,虽然对书中的主旨进行了一些补充性的修订,但仍可能存在着多多少少的不足之处。笔者在此衷心地希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倘若能有方家不吝赐教,则笔者深感荣幸。

## 序 论

### ——主题与形式

本书所要探讨研究的离别诗，实际上是把两个不同的问题合并在一起的课题。

一个是“离别”，从六朝后期（齐梁）至唐代中期（大历·贞元），“离别”在诸多的作品中成为了重要的主题。仔细观察围绕这一主题表现出来的各个时代的风貌，对于理解包括这一时期在内的前后数百年的文学变迁，应该是有效的方法。于是本书以东汉末年的建安时代至中唐前期的大历、贞元时期约六百年的文学史为对象，即针对从曹植到韦应物等离别诗的主要作者，以及离别诗所展示的具体情况进行考察。无论怎样来说，离别的主题在离别诗创作最兴盛的天宝至大历时期，是具有极为特殊地位的重要主题，每位诗人的作品中平均有二成乃至三成属于离别主题的诗作。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个事实，那么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风貌，则可以说是一件相对困难的工作。

本书的写作还有另外一个背景，那就是笔者对文学的更为本质性的问题所抱有的问题意识。

文学的主题不可能是先历史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与永恒不变的人性相呼应而成立的。反之，它是在历史内部，随着人们的价值观变化逐步形成的。将这个命题通过对离别主题的考察



来加以确认,则是本书的另一个课题。笔者所抱有的这个想法,仅限离别这个中国古典诗歌中最为重要的主题而言,大概是并不为错的。

毋庸多言,离别之类的事件,无论是死别还是生别,在哪一个时代都是存在的。在建安这个分裂混乱的时代,离别乃是世间较常见的现象;而另一方面,在所谓太平盛世的玄宗开元年间,离别的问题仍然是较多的现象。因时代不同离别的多寡上虽然有微妙的差异,但离别的事件无论是在哪个时代,总是存在的。

但是,从以离别为主题的作品来看,其具体情况又完全不同。在建安时代,离别诗的数量较少,是一些零星的随想之作。离别事件在很多情况下,都埋没在了没有离别主题的作品中,作为作品本身的主题,几乎没有什么提示。其后离别诗开始不间断地被创作,则是在刘宋鲍照以后、特别是南齐永明年间以后。这里存在的时间差不容忽视。也就是说,作为“实际存在”的离别事件,和“令诗人难以释怀”的离别主题,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事情,这是必须认清的一点。从原理上而言,离别事件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存在,但与此不同的是,离别的主题却是在文学史的某个时点上开始萌芽、形成,最后达到成熟的。因此,本书在选取离别主题试作论述时,其方法是对文学史上离别诗的萌芽、形成、成熟的历史轨迹进行考察。

关于主题的历史考察,首先要观察离别题材在作品中是通过何种样式(表现方法)表现出来的,其次按照时代顺序对样式的演变加以考察。——文学的主题,并不是作为纯粹个体而存在的。通常是其主题与特定的样式合为一体的状态下存在。如果从本书中选取一例论述的话,六朝时期离别诗中送别者的视点“送别”和旅行者的视点“留别”没有区分。也就是说,离别诗的制作注重表达面临离别的人们所共同带有惜别的感情,这一类作品正是六朝